

辽金至明清都城中轴线初步研究

史浩成

关键词：都城 中轴线 辽金时期 宋元时期 明清时期

内容提要：在辽金至明清时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政权受到中原地区汉族文化的影响较大，使得其都城布局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其中都城中轴线的变化尤为突出。辽金时期的都城中轴线布局尚不稳定，中轴线的方向有东西向和南北向两种；宋元时期的都城中轴线布局基本稳定，中轴线的方向为南北向，且基本位于都城的居中位置；明清时期的都城中轴线布局得到了完善与发展，中轴线居于都城轴对称位置，且贯穿都城南北的中心建筑。辽金至明清时期都城中轴线布局的变化与发展，反映出了此时期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也体现出了多元文化融合下的“建中立极”都城中轴线规划理念的发展。

辽金宋元时期战争频发，诸国实行多京制，使得这一时期营建的都城较多，如辽五京、金五京和元上都、中都以及大都等。辽金都城规划尚不稳定，国中常设五京，并且存在东西向或南北向的都城中轴线。宋元都城规划逐渐开始稳定，并且形成以南北向为主的都城中轴线。明清都城规划固定，并且都城中轴线规划基本完善。在这些都城营建的过程中，都城规划设计既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受到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而这为探讨都城规划布局的变化与发展，并进一步研究辽金宋元明清时期多元文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提供了重要材料。尤其是北京，作为辽、金、元、明、清五朝都城，其都城中轴线所蕴含的“建中立极”规划理念，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也为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因此，笔者拟对辽金至明清时期都城中轴线的布局变化与发展以及影响因素等进行初步研究，在多元文化融合的视角下深入解读辽金宋元明清时期都城中轴线规划中“建中立极”理念的发展。

作者：史浩成，北京市，100081，中央民族大学。

一、中轴线基本概况

（一）中轴线定义

在都城营建的过程中，需要对整个都城进行初步的规划设计，其中都城中心线的规划是整个都城规划的重点。随着都城中心线逐渐向都城的中轴位置移动，都城中轴线也随之产生。都城中轴线是指整个都城规划营建的骨干、主轴，其空间方位应处于整个都城的轴对称位置，并可以将都城一分为二。它区别于一般道路，通常是由多个中轴线基点连接而成。中轴线基点一般是指都城的中心建筑物，也就是大朝正殿、主要城门等，如明代皇极殿、清代太和殿等。通常连接中轴线基点的则是都城中心大街。这条中心大街一般贯穿整个都城，以此将各个中轴线基点连接起来，最终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都城中轴线。实际上，都城中轴线往往是虚拟的线，只是在都城营建过程中以规划的形式体现。

（二）中轴线起源

夏商西周时期的都城一般是以双轴线为主，这是因都城中宫城与宗庙相互并列而产生，如偃师二里头宫城遗址、偃师商城宫城遗址等，并且还出现了都城的宫城双轴线模式，体现出的是王权与神权并重的都城轴线规划理念。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都城开始出现单一轴线。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是春秋时期鲁国故城的中轴线^[1]，由此开启都城单一中轴线时代，体现出“王权至上”的都城规划理念，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秦汉魏晋时期的都城中轴线延续单一中轴线的规划，且逐渐向都城的中轴位置靠近，轴线上的中心建筑也逐渐增多。隋唐时期的都城中轴线已经基本位于都城中轴位置，“建中立极”的都城中轴线规划理念也逐渐体现出来。直到辽金宋元明清时期都城中轴线规划基本稳定，中轴线上的中心建筑也形成了一定的规制，而且“建中立极”已经成为主要的都城中轴线规划理念。

二、辽金至明清都城中轴线

（一）辽上京

辽上京为平地起建的新城，始建于神册三年（公元918年），是辽国五京之一，并且也是当时辽国营建最早、使用时间最长、最为重要的都城之一。都城平面略呈“日”字形，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两部分组成。关于皇城门，《辽史·地理志》记载：“东曰安东，南曰大顺，西曰乾德，北曰拱辰。中有大内”，大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门曰东华，西曰西华。此通内出入之所”，

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皆东向”，辽太祖在上京“起三大殿：曰开皇、安德、五鸾”。

根据《辽史》记载和考古勘探可知，皇城四面城墙各有一座城门，分别为东门（安东门）、南门（大顺门）、西门（乾德门）、北门（拱辰门）。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东，现有三门分别为东门（东华门为一门三道的殿堂式城门）^[2]、南门（承天门）^[3]、西门（西华门）^[4]。宫城中的建筑都为东向，宫城东门内有一组三处东向的大型建筑基址。其中一号殿院落坐西朝东，平面呈长方形^[5]，可能为其大朝殿及后宫寝殿。在皇城西南部高地上有一座皇家佛教寺院^[6]，总体呈东向布局，这也与整个皇城的布局有关。

由上可知，辽上京虽分南北二城，但内城存在东西向的中轴线（图1）：以皇城东门（安东门）、宫城东门（东华门）、一号殿院落等为中轴线基点，以贯穿内城东西向的街道为主轴^[7]，再通过街道和中心建筑相结合形成东西向的都城中轴线。东西向的都城中轴线是辽上京布局规划区别其他四京的特殊之处，这也体现出了契丹的民族文化特色。此外，宫城东门的一门三道、宫城一号殿院落的朝向及皇城西南的东向佛寺等，这些都反映出辽上京以东向为尊，也证明辽上京东西向中轴线的特殊性。总体来看，辽上京皇城中轴线的位置大体位于整个皇城的中间，并且大型建筑基本位于中轴线上，这也反映出了中轴线规划在辽上京营建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二）辽中京

辽中京也是一座平地起建的新城，始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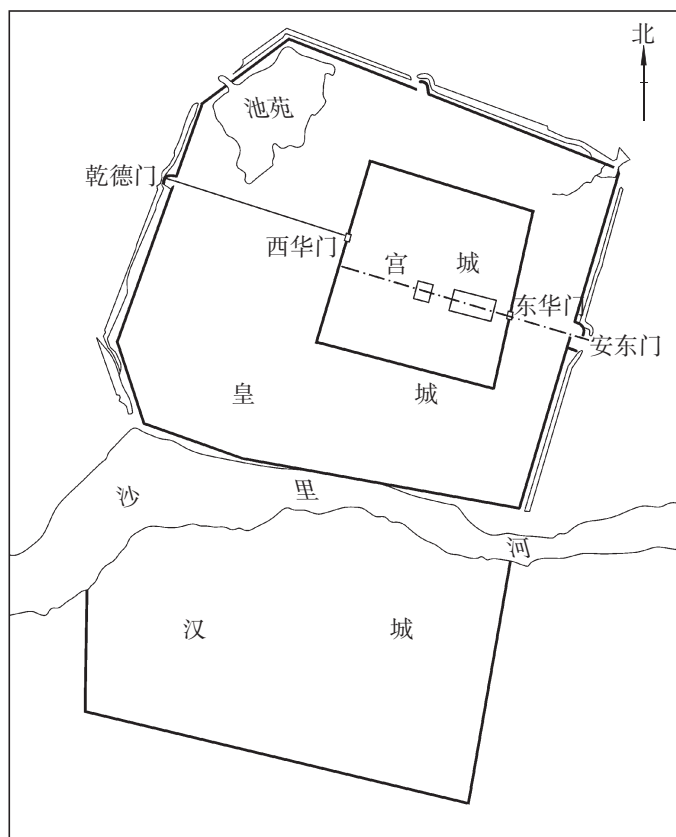


图1 辽上京城中轴线示意图
(改绘自董新林：《辽上京规制和北宋东京模式》图二)

辽中京城由外城、内城和宫城组成，平面呈长方形。关于辽中京城外城，《乘轺录》记载：“南门曰朱夏门、凡三门，门有楼阁”，“三里至第二重城，城南门曰阳德门”，“自阳德门入，一里而至内门，内（曰）闾阖门，凡三门”^[8]。由考古发掘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外城正门为朱夏门，内城位于外城中央偏北，其正门为阳德门。宫城位于内城北部正中。在宫城内的中轴线上有一处大型宫殿基址，可能为大朝正殿遗址。宫城南墙设有三门，其中正门（闾阖门）与内城正门（阳德门）之间有宽敞的大道相连，而外城正门（朱夏门）与内城正门（阳德门）之间也有一条中央主街道相连^[9]。

由上可知，辽中京城的中央位置形成了南北向的中轴线：以外城南门（朱夏门）、内城南门（阳德门）、宫城正南门（闾阖门）、大型宫殿等建筑为中轴线基点，以闾阖—阳德街和朱夏—阳德街这一条南北向的中央街道为主轴（图2）^[10]。此类南北向的都城中轴线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与当时北宋东京城的都城中轴线有相似之处，但尚保留其民族特色。

（三）金上京

金上京是金朝最为重要的都城，也是其最早建立的都城之一。都城分南北二城，南城宽于北城，平面略呈“日”字形^[11]。南城墙西门^[12]与皇城午门正对，南城墙东门与南城北门则位于南城中央，通过中心街道将南城大致分为东、西两部分。南城西北部有皇城，皇城南墙中部的午门外有土阙，其门内的延伸线上有一组宫殿基址，并且其与宫城内部的中轴线相连，在其东、西两侧有大型建筑遗址群^[13]。

由上可知，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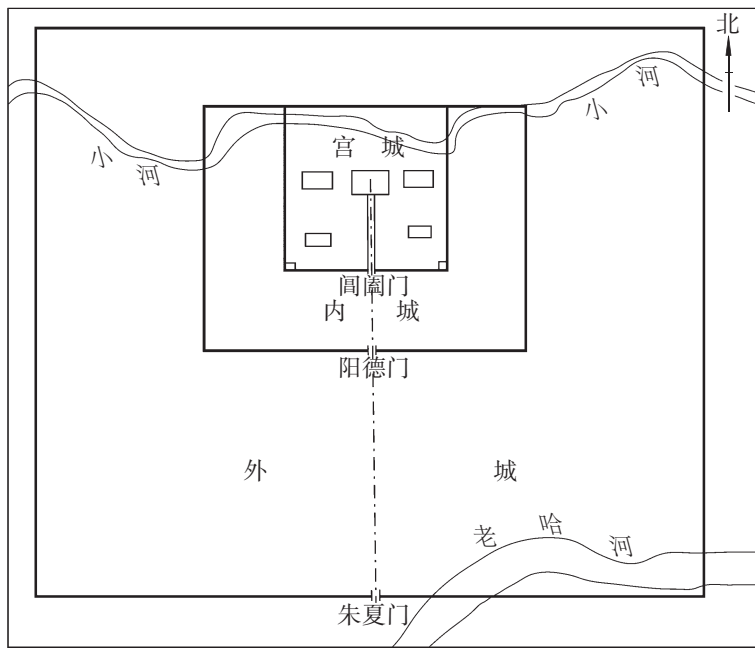


图2 辽中京城中轴线示意图

（改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宋辽金元明卷》图3-2-1）

京城的中轴线由南城墙西门、皇城午门、中心建筑等构成^[14]（图3）。金上京城的中轴线偏离中心位置可能是由当时的都城规划造成的，其中贯穿南北的中心街道起到连接宫城的作用，使宫城与内、外二城成为完整的系统。这些情况不仅体现出金上京城作为都城的独特规划设计，也体现出这种规划设计受到了辽上京城的影响。

（四）金中都

金中都为金国五京之一，始建于天德三年（1151年）。都城由外至内分别为郭城、宫城和皇城。关于金中都，《金史·地理志》记载：“城门十三，东曰施仁、曰宣曜、曰阳春，南曰景风、曰丰宜、曰端礼，西曰丽泽、曰颢华、曰彰义，北曰会城、曰通玄、曰崇智、曰光泰。”《大金国志》记载，内城应分为两重，宣阳门是皇城的南门，应天门是宫城的南门^[15]。由上可知，郭城南墙有三门，正南门为丰宜门，直通城墙北门（通玄门）^[16]。宫城位于郭城的中央偏西，其正南门为应天门，正北门为拱宸门。宫城内部偏南为前朝正殿（大安殿），北部为内朝正殿（仁政殿）。皇城位于宫城之南，与宫城相连，其中皇城的南门为宣阳门^[17]。

由上可知，金中都存在明确的中轴线：以郭城正南门（丰宜门）、皇城南门（宣阳门）、宫城南门（应天门）、前朝大安殿、内朝仁政殿、宫城北门（拱宸门）、郭城北门（通玄门）等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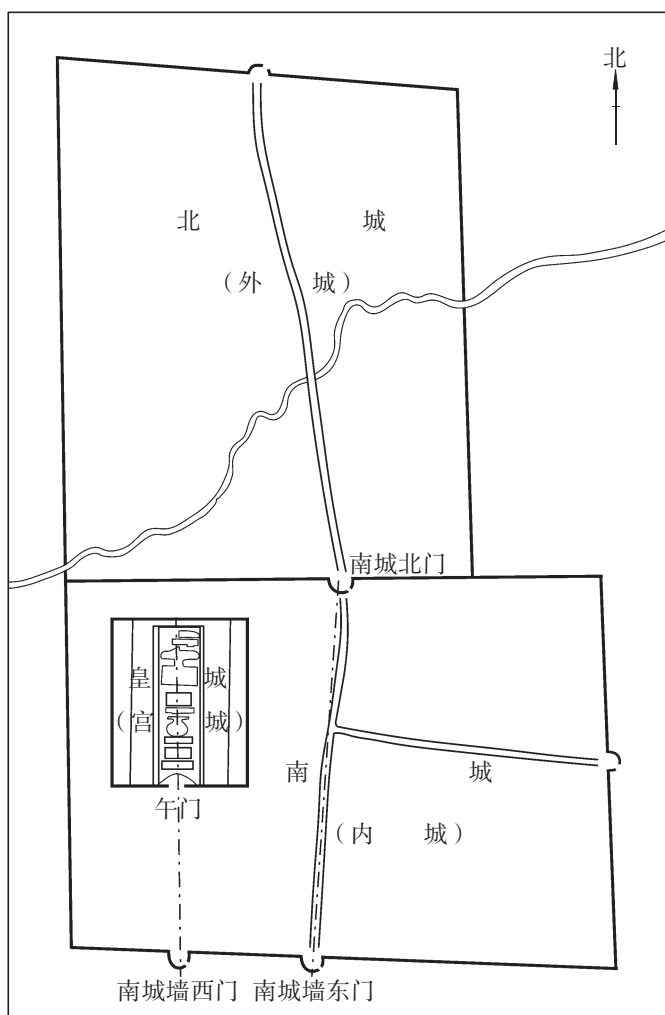


图3 金上京城中轴线示意图
（改绘自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南城南垣西门址发掘简报》图二）

轴线基点，以丰宜—宣阳街和拱宸—通玄街为主轴（图4）^[18]。金中都的中轴线位置偏西，其连接郭城、皇城和宫城，并将宫城中的前朝大安殿、内朝仁政殿连接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建中立极”的中轴线规划理念。

（五）北宋东京

北宋东京为北宋五京之一，在五代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此地初设为开封府，号东都，是当时北宋的政治、经济中心。北宋东京城平面呈“回”字形，由外城、内城和宫城三城内外相套。目前外城共发现城门和水门遗迹12处^[19]，其中南薰门为外城正门。内城有10座城门，其中正门为朱雀门。宫城仅发现3处门址，即正南门宣德门（乾元门）、北门（拱宸门）和东门（东华门）。宫城布局沿袭“前朝后寝”之制，在宫城内的轴线上发现“凸”字形夯土建筑基址“龙亭大殿”，应是宫城内的重要宫殿基址^[20]。

由上可知，北宋东京城存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以外城南门（南薰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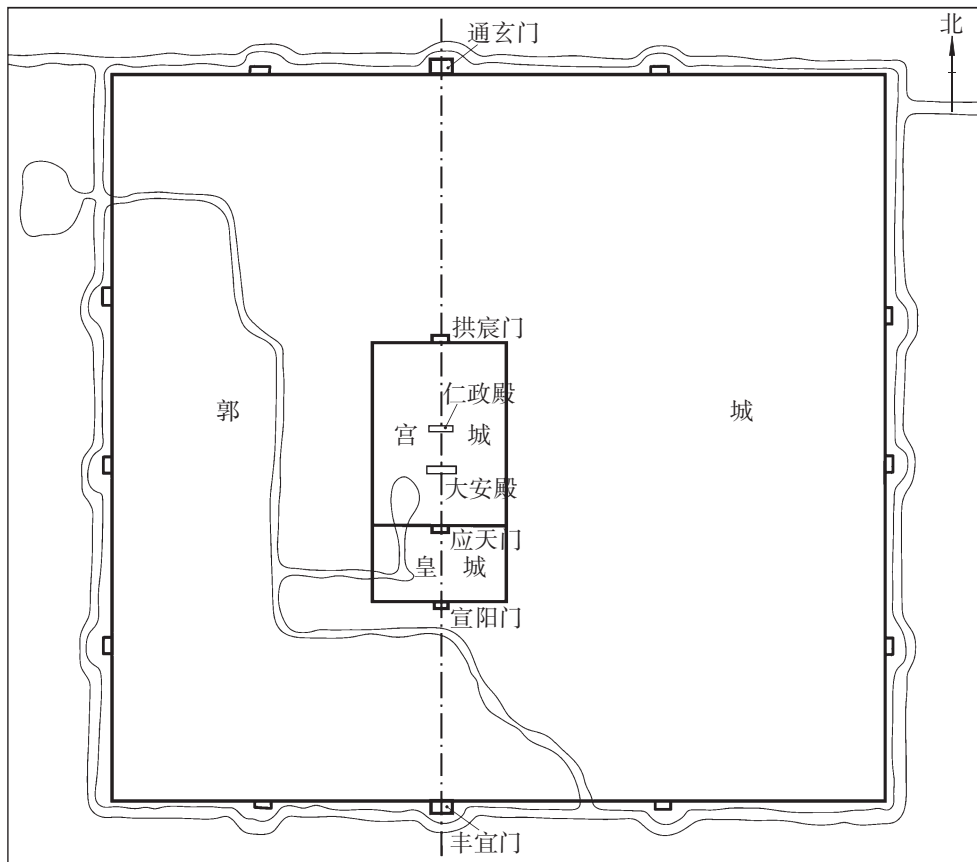


图4 金中都中轴线示意图

（改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宋辽金元明卷》图5-2-1）

城南门（朱雀门）、宫城南门（宣德门）、中心建筑“龙亭大殿”、宫城北门（拱宸门）等为中轴线基点，以南北向街道为主轴（图 5）^[21]。北宋东京城开放式街巷格局使其呈现出多轴线化现象。鉴于此，笔者认为多轴线化格局中也是有一个主轴，就是整个都城的中轴线。通过这个主轴体现出都城中轴线规划的“建中”原则，并且为后期都城规划设计提供参考。

（六）南宋临安

南宋临安于绍兴八年（1138 年）正式成为南宋都城，形制基本承吴越国都和北宋杭州城之旧。南宋临安城在总体布局上有外城和皇城两重^[22]。外城又称罗城，平面呈“腰鼓形”，有五座水门。城内的街道主要以御街为主，贯通南北，其南起自皇城北门（和宁门），向北经朝天门，众安桥、观桥和万岁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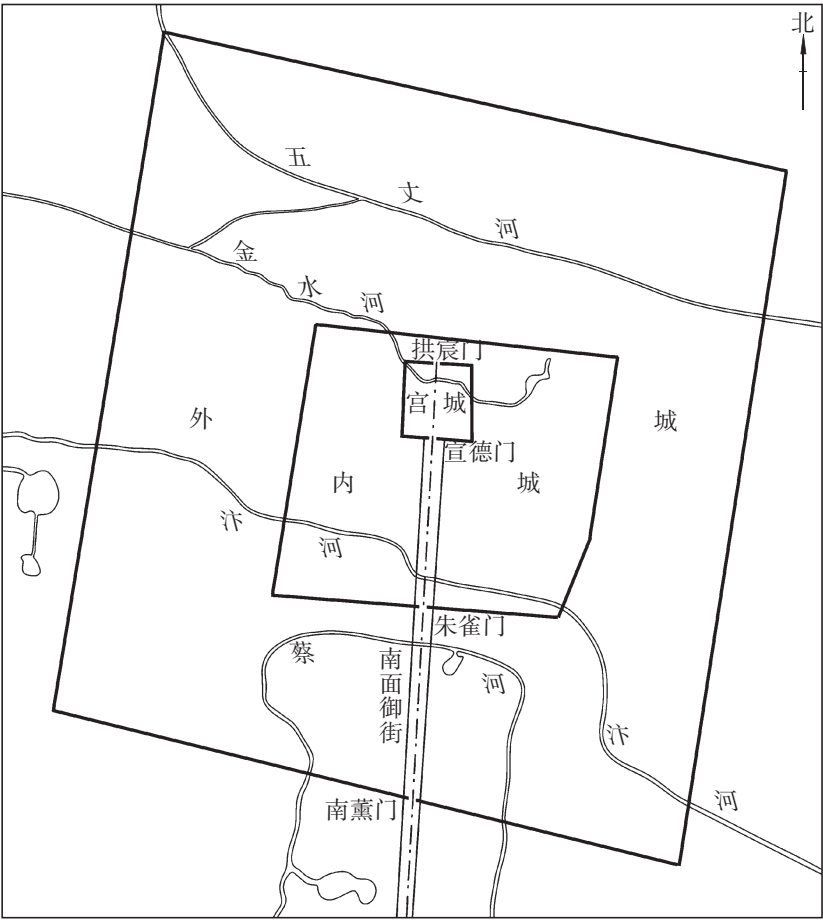


图 5 北宋东京城中轴线示意图
（改绘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开封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 2012~2017 年勘探发掘简报》图一）

然后西折抵景灵宫前斜桥（中正桥），向北出外城抵水门（余杭门）^[23]。

由上可知，南宋临安城的御街具有不一般的意义，以御街为主轴，通过御街上的门、桥构成整个城市的中轴线（图6）^[24]。

南宋临安城的中轴线：皇城北门（和宁门）、朝天门、众安桥、观桥、万岁桥、斜桥（中正桥）、水门（余杭门）。在御街一和宁门一朝天门段分布有大量中央官署衙门及府邸官宅等，故此段以政治礼仪性为主。御街一朝天门北段则主要以商业活动为主，同时具有一定的政治礼仪性（景灵宫）。这也说明御街在临安城中的重要地位，以此形成的中轴线不仅具有交通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政治礼仪、商业等诸多功能。因此，南宋临安城中轴线是以御街为主轴，连接各个中轴线

基点。由于目前对于皇城的考古发掘不充分，皇城内中轴线上的中心建筑情况尚不明确。

（七）元上都

元上都是元朝最早修建的都城之一，始建于1256年，历时三年建成，初名开平府。元上都由外城、皇城和宫城构成。皇城位于外城的东南部，宫城位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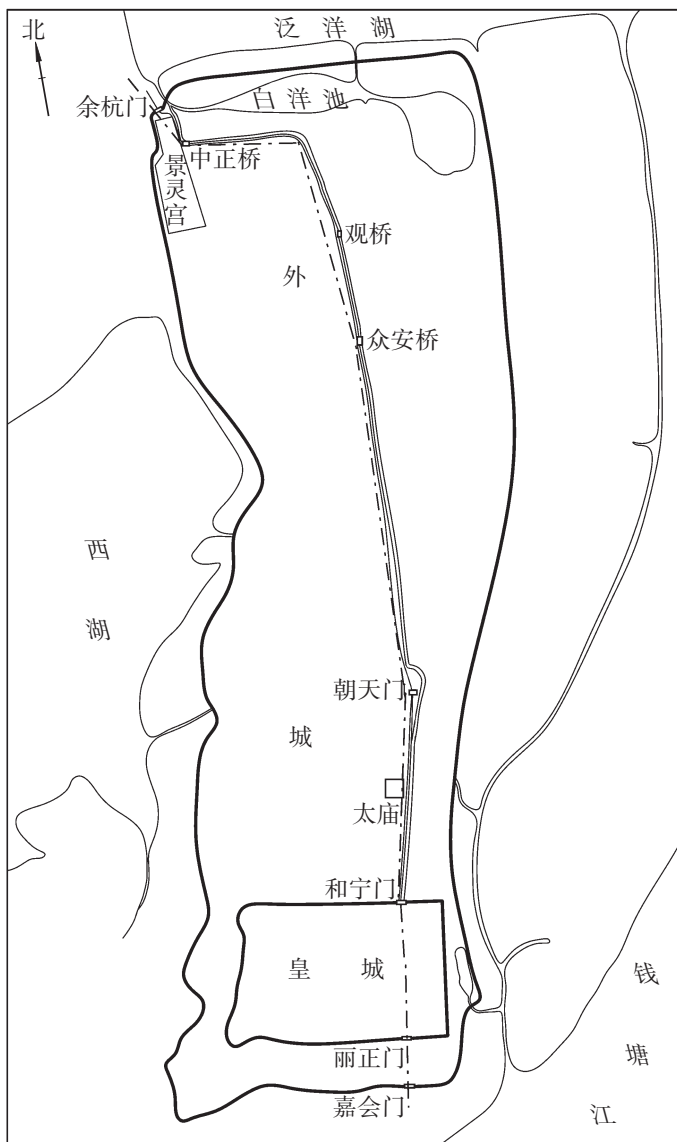


图6 南宋临安城中轴线示意图

[改绘自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上）图13-2]

皇城中部偏北。宫城南门为御天门。御天门内纵街位于宫城中央，连接宫城主要宫殿。皇城南门为明德门（与御天门相对）。皇城南门（明德门）和宫城南门（御天门）由南北向御街相连接^[25]。

由上可知，元上都的中轴线：以皇城南门（明德门）、宫城南门（御天门）、宫城等重要建筑为中轴线基点，以皇城南北向御街、御天门内纵街为主轴（图7）^[26]。总体来看，元上都的中轴线并非位于都城中间位置，而是位于皇城与宫城的中央位置，这也体现了“皇权至上”与“因俗而治”的都城规划思想。元上都在规划设计上主要体现军事与政治功能，且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立极”的中轴线规划理念。

（八）元大都

元大都是元朝中后期较为重要的都城，始建于至元四年（1267年）。元大都整体由外城、皇城和宫城环套，平面呈“回”字形布局。《元史·地理志》记载，大都城共有城门11座。南面三门，中为丽正门。北面二门，东称安贞门，西称健德门。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外城南门为丽正门，皇城南门为灵星门，宫城南门为崇天门，北门为厚载门，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今北京鼓楼北）位于宫城中央南北大街的北部终点，南北纵街和东西横街是全城的主干街道。元大都的居民区规划整齐，平面呈棋盘状，形成开放式街巷格局^[27]。由此可以看出，整个元大都经过精心规划，都城中的功能区规划明确，中轴线上的中心建筑完备，体现出国际大都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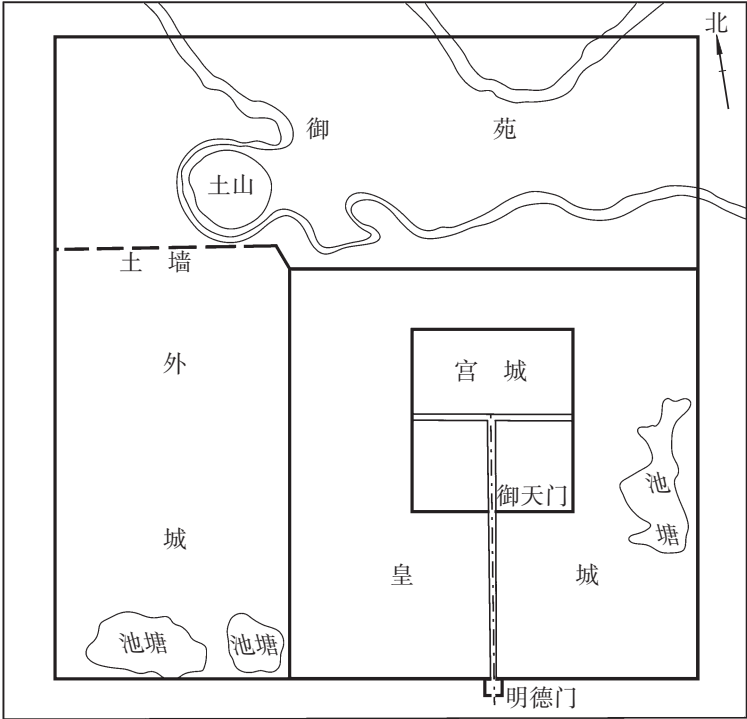


图7 元上都中轴线示意图

[改绘自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上）图15-1]

风范。

由上可知，元大都中存在明显的中轴线：以外城南门（丽正门）、皇城南门（灵星门）、宫城南门（崇天门）、宫城北门（厚载门）、万宁寺（中心阁）等为中轴线基点，以纵贯南北的中央街道为主轴（图8）^[28]。虽然元大都为棋盘状格局，存在多轴线化现象，但都城中轴线十分明确并且位置居中，体现出“建中立极”的都城中轴线规划理念。元大都是中国古代晚期城市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为后期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发展奠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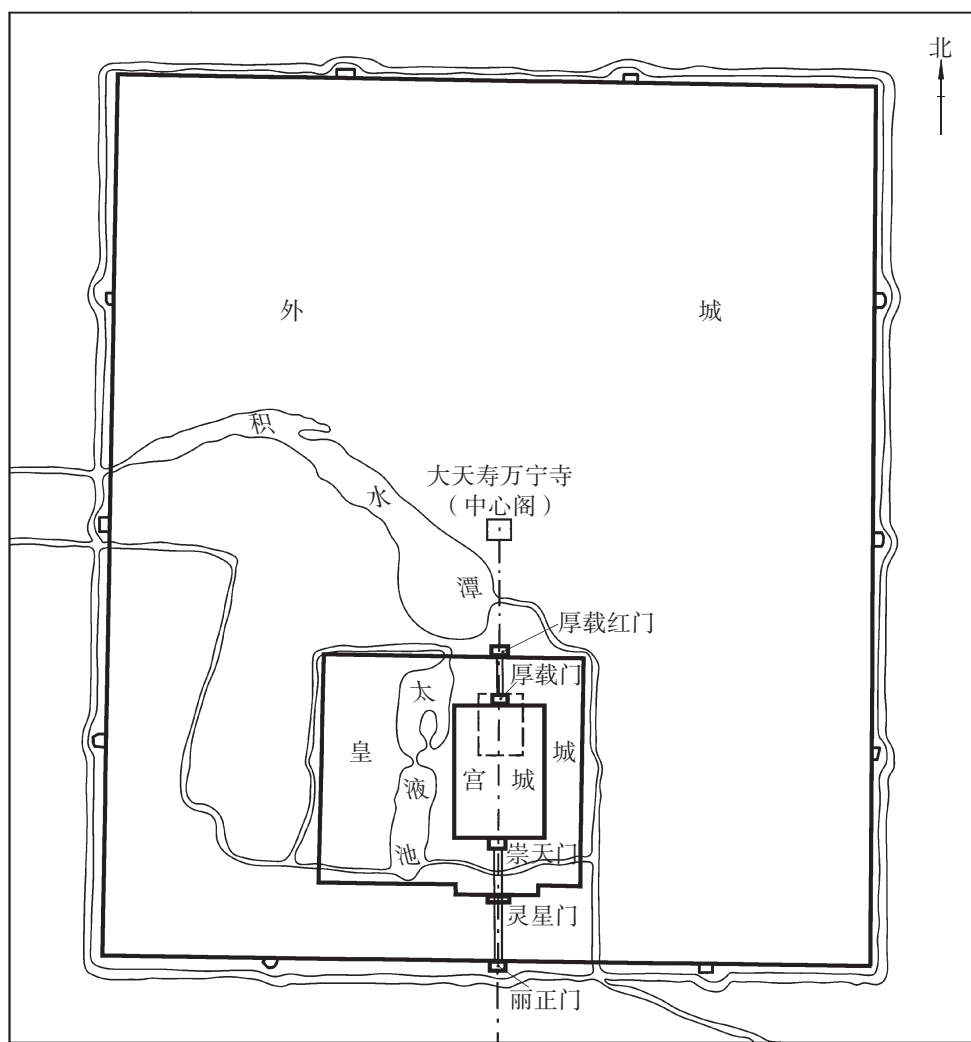


图8 元大都中轴线示意图

（改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630页“元大都平面复原图”）

基础。

（九）元中都

元中都于大德十一年（1307 年）始建，至元武宗去世后废弃。元中都地处漠北，是上都、大都间的交通要冲，也是蒙古贵族主要的聚居区之一。元中都由外城、皇城和宫城三城环套。据考古资料可知，宫城四面城墙中间有城门，宫城南门向北的御街直通 1 号殿址（大朝正殿）；皇城南墙辟南门，为三门道，每个门道存在将军石，与宫城南门相对应^[29]。

由上可知，元中都存在十分明显的中轴线，位于皇城与宫城之间（图 9）：以皇城南门、宫城南门、1 号殿址等为中轴线基点，以城门之间的御街为主轴^[30]。都城以中轴线为中心，整体规划清晰。元中都虽未建成，但也体现出都城中轴线规划思想——“建中立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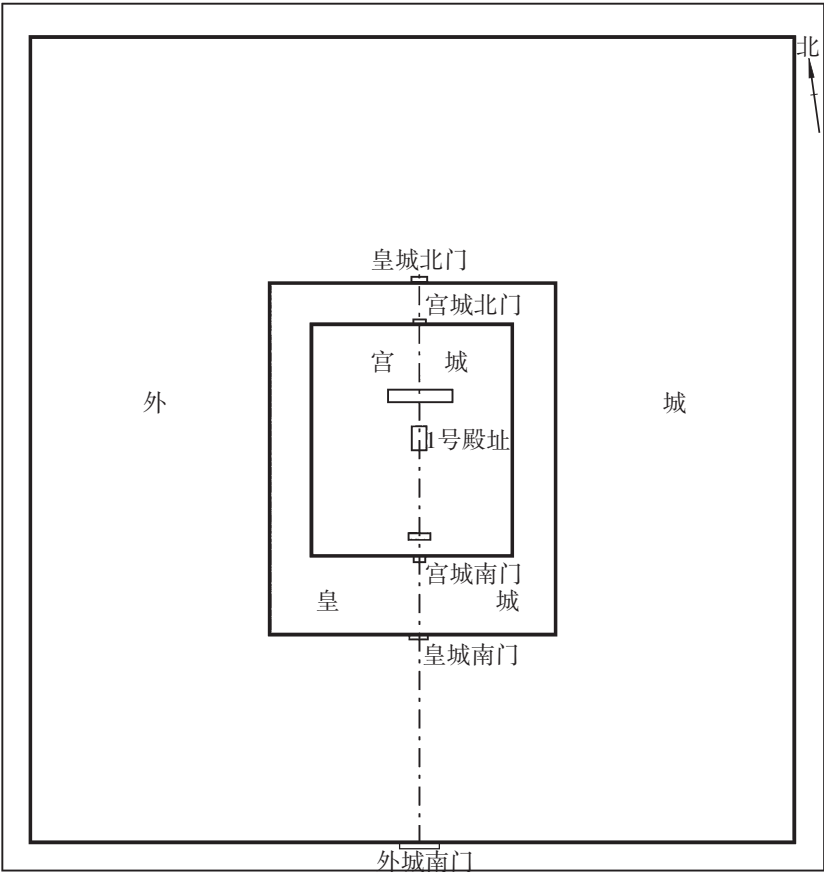


图 9 元中都中轴线示意图

[改绘自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上）图15-2]

(十) 明中都

明中都于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始建，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罢建，其时基本建成。明中都由外城、禁垣和皇城环套而成。外城东、西、南三面城墙各辟三座城门，北部城墙辟两座城门，外城正南门为洪武门。禁垣四面各辟一门，正南门为承天门，正北门为北安门。皇城在禁垣中部，四面亦各辟一门，皇城正南门为午门，正北门为玄武门，午门外两侧各置一阙，形制与明清北京城午门相近，皇城内有大型建筑基址（奉天殿）^[31]。

由上可知，明中都存在明确的中轴线（图10）。中轴线自南向北依次为：外城正南门（洪武门）、禁垣正南门（承天门）、皇城正南门（午门）、大内正门（奉天门）、大朝正殿（奉天殿）、皇城正北门（玄武门）、禁垣正北门（北安门）^[32]。明中都基本上以中轴线为核心而营建，体现出了都城规划的整体性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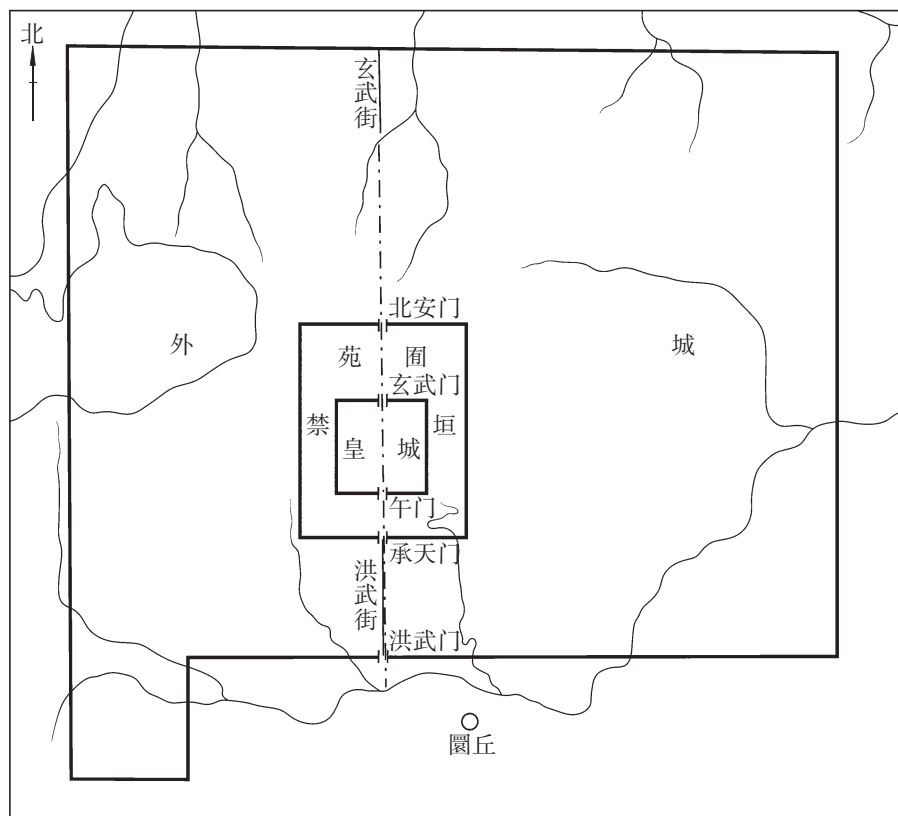


图10 明中都中轴线示意图

[改绘自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下）图23-1]

（十一）明南京城

明南京城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 年）定为京师。该城由外郭城、京城（外城）、皇城和宫城环套。外郭城设 16 座城门。皇城位于京城东南部，皇城四面城墙各辟一门，正门为南城门（承天门），北门为北安门。宫城基本位于皇城中部，四面城墙各辟一门，正门为南城门（午门），北门为玄武门。在宫城午门和玄武门之间，自南向北依次分布有奉天、华盖、谨身前朝三大殿与乾清宫、省躬殿、坤宁宫后寝三大宫殿^[33]。

由上可知，明南京城的中轴线（图 11）自南向北依次为：正阳门、洪武门、承天门、午门、玄武门、北安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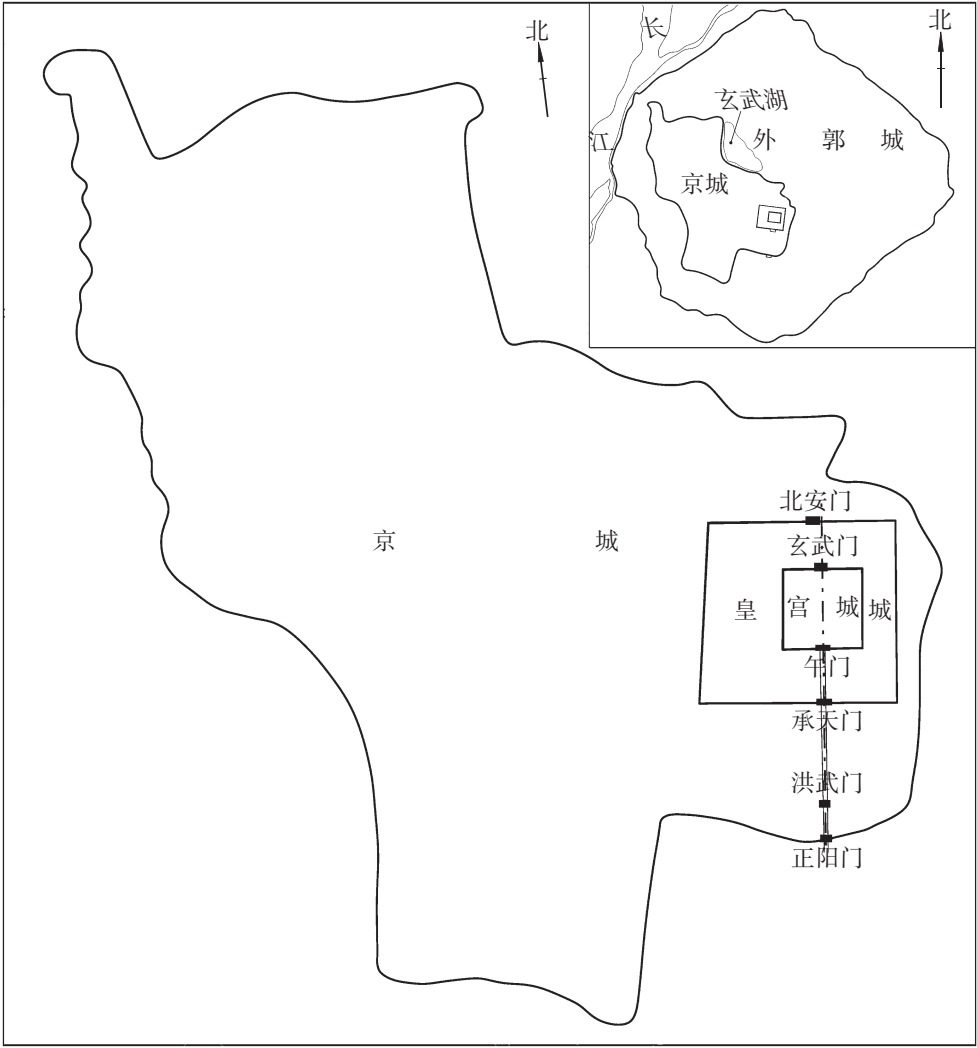


图 11 明南京城中轴线示意图
[改绘自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下）图23-2]

门、皇城正南门（承天门）、宫城正南门（午门）、奉天门、大朝正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乾清门、乾清宫、省躬殿、坤宁宫、宫城正北门（玄武门）、皇城正北门（北安门）^[34]。皇城、宫城整体都位于都城的东南部，因而宫城之中的大朝正殿、宫城正门和皇城正门的方位也偏于东部，这使得都城中轴线无法位于东西居中位置。不仅如此，明南京城的中轴线实际上也是皇城与宫城的中轴线，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皇权至上”的思想。

（十二）明北京城

明北京城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之后的都城。其平面呈不规则的“日”字形，由南城（旧称外城）和北城（旧称内城）二城南北相连而成^[35]。北城中心为皇城所在，共有9座城门，正南门为正阳门^[36]。皇城位于北城中部偏南，皇城南门（承天门）向南至内城南门（大明门）之间为千步廊，街道两侧为中央官署区。宫城四面各辟一门，正南门为午门，北门玄武门外为万岁山。宫城内为前朝后寝布局，前朝为皇极殿，后宫为乾清宫。宫城午门之外，左部为太庙，右部为社稷坛。南城主要是工商业区，共有7座城门，正南门为永定门^[37]。

由上可知，明北京城中北城的街道格局、重要建筑等部分沿用前朝元大都的部分规划，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规划了宫城和皇城部分，形成三城环套的“回”字形布局。明北京城继续沿用元大都时期的都城中轴线：从北部起点钟鼓楼向南经皇城正北门（北安门）、北中门、万岁山、紫禁城玄武门和正南门（午门）、皇城正南门（承天门）、北城正南门（正阳门），至南城正南门（永定门）止（图12）^[38]。明北京城的中轴线两侧皆为重要礼仪性建筑（社稷坛、太庙），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

（十三）清北京城

清北京城作为女真入关后使用时间最长且极为重要的都城，其格局完全承袭明朝的“日”字形格局。该城由外城（即南城）、内城（即北城）和皇城组成。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材料可知，清北京城中轴线沿袭了明北京城中轴线，只是城门与宫门、宫殿等名称有所不同。

清北京城中轴线南起外城南门（永定门），向北依次为正阳门、大明门、千步廊、金水桥、承天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大朝正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钦安殿、玄武门，北上经北上门、万岁门、景山、寿皇殿至北安门，再至鼓楼、钟楼止（图13）^[39]。总体上看，清北京城中轴线已经形成完整的中轴线体系，并且具有政治、经济等功能，展示出了“建中立极”的都城中轴线规划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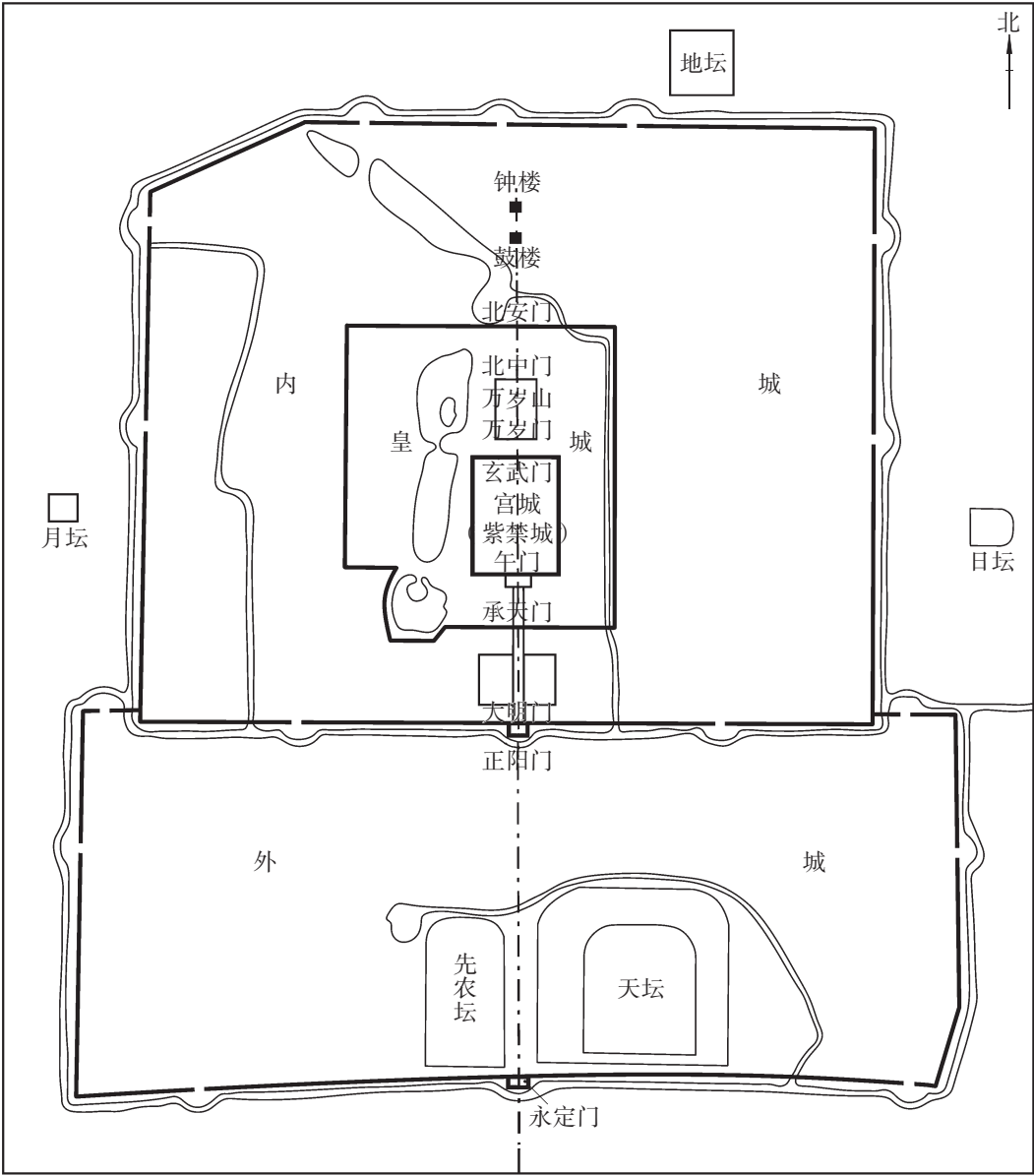


图 12 明北京城中轴线示意图
(改绘自秦大树：《宋元明考古》第85页图一二)

三、中轴线变化趋势与影响因素

(一) 各期特点

1. 辽金时期

辽金两朝都属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并且都营建五京，实行捺钵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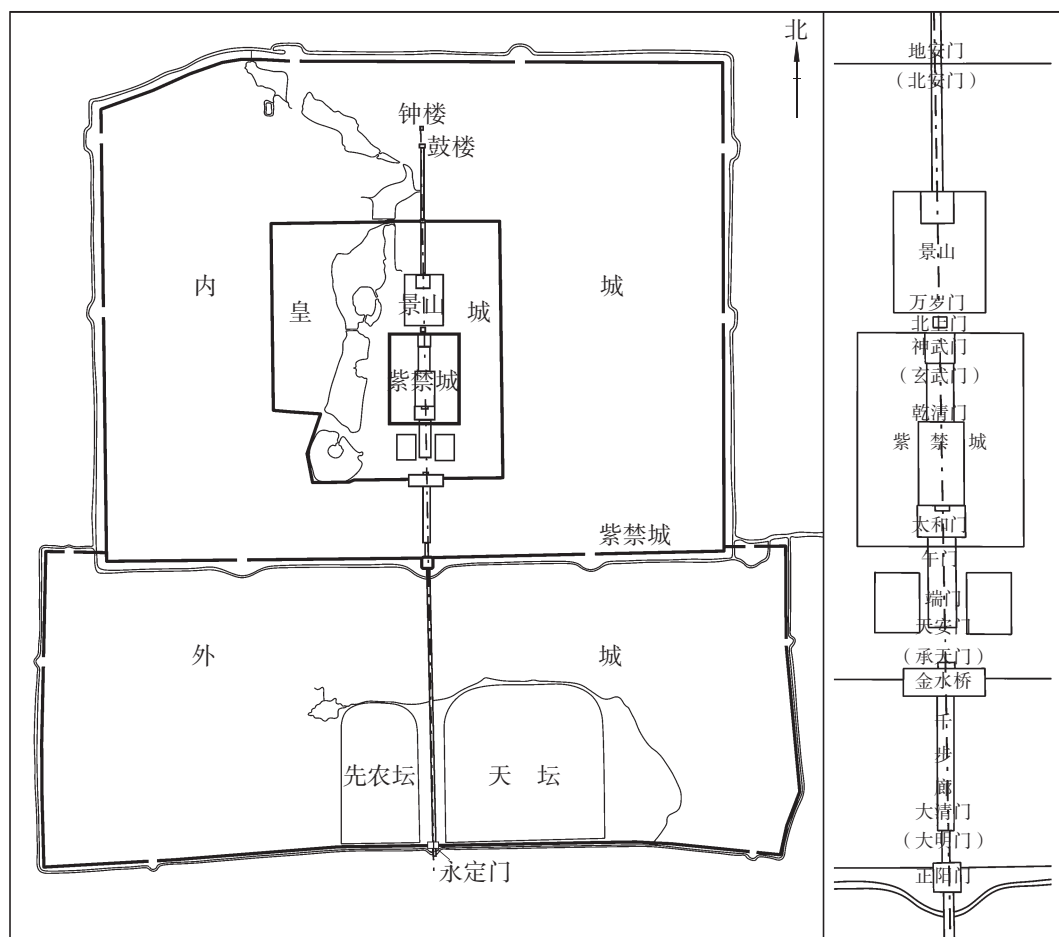


图 13 清北京城中轴线示意图

[改绘自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下）图23-7]

因此，在都城营建的过程中就带有大量民族文化特色。在辽上京城都城的营建规划中，北方游牧文化特色尤为突出。辽上京城虽存在中轴线，但仅限于北城（皇城）之中，而且中轴线的朝向为东向。不仅如此，契丹与女真在营建都城的过程中，也借鉴中原汉族文化思想。尤其是辽中京城与金中都城，平面布局与中原地区都城（北宋东京城）的布局有相似之处，都采用“回”字形格局。都城整体由外城、内城和宫城三城环套。这使得都城中轴线逐渐发展为大致南北走向。总体上看，中轴线尚处于都城偏西或偏斜位置，并未完全处于东西居中的位置。

可见，这一时期都城中轴线正处于转变与发展期。整体来说，辽金都城的营建体现了“皇权至上”与“因俗而治”的思想。此时期的都城中轴线规划受

到中原文化和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双重影响，这使得都城中轴线规划开始朝着南北走向、东西居中和宫殿位前的空间方位发展。

2.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战争频发，使得都城更换频繁。都城中轴线也逐渐朝着南北走向的空间方位发展，其中外城正门、皇城正门和宫城（大朝正殿、后寝宫殿）等主要建筑都位于中轴线上，通过南北向的御街或中央大道相连接。虽然这一时期中轴线制度尚不完备，但中轴线的方位朝向基本为南北走向。自北宋东京城改唐以来都城的封闭式里坊布局为开放式纵横街巷格局，使得都城中轴线一般位于街道之中。由此中轴线的空间方位并不完全位于都城东西居中位置，而是在都城偏东或偏西位置。

可见，这一时期都城中轴线处于定型期。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都城中轴线制度，并且不断完善发展，体现出一定的“建中立极”的都城中轴线规划理念。正是由于这一时期都城布局发生改变，使得都城中轴线也发生了变化。此时期的都城中轴线不仅体现出政治礼仪性，也体现出了商业经济性。

3.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位置、内涵等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发展的顶峰。都城中轴线实际并不是贯通南北的街道，而是由中轴线基点与主轴组成。此时期中轴线基点是郭城、皇城和宫城的正南门，大朝正殿如明皇极殿、清太和殿等，以及后宫寝殿等主要建筑，而主轴则是南北向的御街或大道。

可见，这一时期是都城中轴线制度发展的成熟期。都城中轴线制度已经完备，形成了东西居中、南北向的都城中轴线，以此表现出“建中立极”的都城中轴线规划理念。都城中轴线以外郭城正门为起点，向南经皇城正门、宫城正门、大朝正殿（三大殿）、后寝宫殿，出宫城北门，向北入景山，至钟鼓楼止。都城中轴线不仅在空间方位、政治功能方面显示出重要地位，其两侧分布的礼制性建筑也体现出礼仪功能。

（二）总体变化趋势

1. 空间方位

辽金时期都城中轴线一般偏离于都城中轴，而且都城中轴线朝向有的也不固定，如辽上京、金上京等。宋元时期都城中轴线开始逐渐由偏离中轴位置（偏东或偏西），向都城东西对称轴靠近，这一现象在新修建的都城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元大都、元中都等。明清时期都城中轴线基本位于都城东西对称的

中轴位置,说明这一时期都城营建是以轴对称进行规划设计的。

总体来看,辽金至明清时期都城中轴线的空间方位变化,是由偏离东西对称轴位置到接近东西中心对称轴位置,最后到完全位于东西中心对称轴位置,反映出“建中”这一都城中轴线规划理念。

2. 轴线建筑

辽金时期都城中轴线建筑尚不完备,仅大朝正殿为主要的中心建筑。到宋元时期,中轴线建筑逐渐增多,出现由大朝正殿、后宫寝殿构成的“前殿后寝”的建筑规制。直到明清时期,北京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轴线建筑规制:南起外城南门(永定门),向北依次为正阳门、大明门、千步廊、金水桥、承天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大朝正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钦安殿、玄武门,北上经北上门、万岁门、景山、寿皇殿至北安门,最后至鼓楼、钟楼止。简单来说,就是都城中轴线南起外城正南门,向北经内城正南门、皇城正南门、大朝正殿、后宫寝殿、皇城正北门、皇家御苑,最后至鼓楼、钟楼止,以上便是都城中轴线上必须具有的中轴线建筑。因此,辽金至明清时期的中轴线建筑经历了由简到繁、由少到多的过程,并且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一定的中轴线建筑规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央权力的不断加强,以及统治者对文化礼仪的重视。

3. 规划布局

辽金至明清时期,都城中轴线制度逐渐发展完善,形成了一套严整的中轴线规划制度。辽金时期都城中轴线的规划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在空间方位、中心建筑等方面只具雏形。宋元时期大部分都城都是新修建的,都城中轴线则位于东西轴对称的位置,并且中轴线建筑相对完备,体现出一定的都城中轴线规划。明清时期都城中轴线制度基本形成:南起各城正南门,向北至大朝正殿、后宫寝殿、皇家御苑,最后至鼓楼、钟楼止。这也反映出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规制在不断完善发展,直到明清时期达到顶峰,从侧面体现出“建中立极”的都城中轴线规划理念。

(三) 影响因素

1. 旧城建筑

中轴线的规划难免受到旧建筑的影响。辽金至明清时期,北宋东京城、南宋临安城、金中都和明南京城的中轴线并不处于都城的轴对称位置,可能是由于这些都城并不是新修建的,而是沿用前朝旧城的基础建设。由上文可知,这一时期大多数都城都属于新建的都城,辽中京、金中都、元大都和元中都的中

轴线多位于都城的轴对称位置，并且中轴线上的中心建筑也相当完备，形成一定的规制。以上情况反映出统治者力求营建新都城的政治愿景，也体现出都城规划者对于中轴线规划的思考。营建新都城相比利用旧城改造而言，前者相对比较困难，且需耗费大量时间、人力、财力等。因此，此时期利用旧城改造来规划设计都城，也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繁荣与政权稳定。

2. 地理环境

辽金至明清时期，都城中轴线部分偏离都城的轴对称位置，使得都城的布局并不是中规中矩，这可能是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新修建都城的地理位置多依山傍水，不得不考虑地理环境因素。皇城和宫城偏离中心位置，位于外城内部一侧，如明中都；或在外城外部一侧，如元上都。这种布局是由于都城地势低洼或处于山脚之下，考虑到皇城和宫城的防水、防御等方面问题，而不得不将其皇城、宫城营建于偏离中心的位置。

3. 文化传统

辽金至明清时期，都城中轴线逐渐形成了“建中立极”的规划理念，使得都城中轴线开始逐渐向都城轴对称位置靠近。辽金两朝属于少数民族政权，其都城营建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并且呈现出一定的民族特色，如辽上京东西向的都城中轴线、金上京偏西的都城中轴线等。明清时期都城中轴线制度完善，“建中立极”成为都城中轴线的规划理念。“建中”就是中轴线在空间方位上位于都城“四方”之“中”，即东西南北之“中”。“立极”就是都城中轴线基点如大朝正殿及中心建筑等位于中轴线的中心方位之上。

四、结 语

辽金至明清时期都城中轴线的变化发展是“动态”的，都城中轴线规划或使用理念基本一脉相承，都是以“建中立极”为理念进行规划。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都城中轴线表现出空间方位由偏离到“建中”。中轴线建筑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由此体现出“立极”的规划理念，并且逐渐形成一定的都城中轴线规制。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更强调“多元一体”，展现了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影响力和兼容性，反映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不断融合和走向统一的大趋势，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规制发展的集大成者。无论是空间方位，还是中轴线建筑都十分完善，体现出都城中轴线的规划理念——“建中立极”，并且从侧面也反映出“皇权至上”的思想。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杰出范例，代表了中

华文明在城市规划建设上的伟大创造与杰出才能,集中展现了大国首都形象和中华文化魅力^[40]。2024年7月27日,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获得成功。北京中轴线作为“活态”的文化遗产、城市历史景观、文化历史记忆等,在遗产保护方面极具挑战性,需进一步加强对北京中轴线作为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力度,探讨新型的保护机制,为其未来发展提供新方向,也为世界遗产的保护做出贡献。

注 释

- [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阜鲁国故城》第25~27页,齐鲁书社,1982年。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6期。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5期。
- [4] 董新林等:《考古发掘首次确认辽上京宫城形制和规模》,《中国文物报》2015年1月30日第4版。
- [5] 董新林等:《辽上京城址首次确认曾有东向轴线》,《中国文物报》2016年5月6日第4版。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考古》2013年第1期。
- [7] 董新林:《辽上京规制和北宋东京模式》,《考古》2019年第5期。
- [8] (宋)路振:《乘轺录》,中华书局,1991年。
- [9] 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辽中京遗址》,《文物》1980年第5期。
- [10] a.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27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宋辽金元明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 [11]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皇城西部建筑址2015年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6期。
- [12]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南城南垣西门址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5期。
- [13] 赵永军:《金上京城址发现与研究》,《北方文物》2011年第1期。
- [14]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皇城西部建筑址2015年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6期。
- [15] (宋)宇文懋昭著,崔文印校正:《大金国志校正》,中华书局,1986年。
- [16] 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
- [17] 齐心:《近年来金中都考古的重大发现与研究》,《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二辑第15页,1994

年。

- [18] 徐莘芳：《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第66～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19] 开封宋城考古队：《北宋东京外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文物》1992年第12期。
- [20] 田凯：《北宋开封皇宫考辨》，《中原文物》1990年第4期。
- [2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开封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2012～2017年勘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9年第1期。
- [22] 阙维民：《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第3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 [23] 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第149页，1985年。
- [24]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上）第42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 [25] 魏坚：《元上都及周围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
- [26]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上）第48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 [27] 徐莘芳：《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第107～1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28]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63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 [29]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上）第49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 [30]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上）第49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 [31] 王剑英：《明中都研究》第207～44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
- [32]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下）第94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 [33] 邹厚本：《江苏考古五十年》第413、414页，南京出版社，2000年。
- [34]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下）第94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 [35] 侯仁之：《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3期。
- [36] [瑞典]喜仁龙著，许永全译：《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第36页，燕山出版社，1985年。
- [37] 张先得：《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一）》，《古建园林技术》1985年第3期；《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二）》，《古建园林技术》1985年第4期。
- [38] 秦大树：《宋元明考古》第85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 [39]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上）第49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 [40] 刘治彦：《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中的城市治理创新——基于民生改善的视角》，《国家治理》2024年第18期。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Central Axis of the Capital City during the Liao and Jin through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i Haocheng

KEYWORDS: Capital City Central Axis Liao and Jin Periods
Song and Yuan Periods Ming and Qing Periods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ethnic integration from the Liao and Jin through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minority regimes we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Han culture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resulting in considerable changes to the layout of their capital cities, particularly in the central axis. In the Liao and Jin periods, the central axis of the capital city was not yet stable, exhibiting both east-west and north-south orientations. By the Song and Yuan periods, the layout of the central axis became relatively stable, predominantly aligning north-south and situated roughly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saw the refin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s central axis, with the axis positioned symmetrically and traversing the central buildings of the city from north to south.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central axis layout of the capital cities from the Liao and Jin to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reflect the processes of pluralistic cultural exchang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during this time. They also demonstr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establishing the center and aligning the extremes” concept in urban planning during pluralistic cultural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 洪 石)